杨虎城将军在普陀山

◎史海钩沉 □孙峰

这是一幅关于舟山普陀山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三个人分别穿着长衫布袍、西装和中山装,这是著名爱国人士、“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普陀山前寺的永寿桥与多宝塔,塔前围墙上“多宝塔院”四字依稀可辨。



穿长衫着布鞋的杨虎城将军

1927年6月,杨虎城率领部队参加北伐,在陇海铁路东段归德、徐州等地与直鲁联军的8个军进行一场拉锯战。部队损失较大,杨虎城将部队带到其认为比较安全的皖北地区——安徽太和。在那里,他结识了谢葆真,并于1928年1月与谢结婚。

杨虎城乃一介军人,为什么反而没有像身边的两位那样穿正装呢?

当时的杨虎城是到普陀山来散心的,选择微服出行的杨虎城显得格外低调。据杨虎城将军孙子杨瀚先生在《杨虎城大传》中记载:“(杨虎城)到普陀住了月余。”1927~1928年之交,杨虎城处在多重矛盾的漩涡中,内心的烦闷需要得到调整,而静谧的普陀山是最好的养心之处。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多事之秋。那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在那一年参加北伐的杨虎城部队里,仍有许多共产党员在活动。杨虎城将军贯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不仅不在自己的部队中实施“清共”,反而接纳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在其指挥的十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其个人在政治上甚至还积极争取要加入共产党。可惜的是,当时的皖北特委按照上级指示,酝酿以杨虎城所部的教导团一小部发动皖北暴动,杨虎城不同意仓促发动起义,他希望“为了保全革命力量而避免暴动”,“但我并不怕牺牲”。当时南京政府派了一个叫韩振声的反共分子,来皖北督促杨虎城“清党”,并拉拢杨虎城归顺蒋介石。杨虎城决定随韩振声去南京,他认为暂时离去,一方面可以为皖北暴动扫除障碍,另一方面,离开皖北可摆脱自己的困难处境。杨虎城当时名义上归属冯玉祥指挥,但是冯玉祥并没有将杨视作嫡系给予支持,与冯玉祥关系不是很理想的杨虎城也想为自己的部队寻找出路,他希望与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一定的关系,所以也愿意随韩振声南下去南京活动。

不仅如此,当时的杨虎城还处在蒋、冯矛盾的漩涡中。据杨瀚在《杨虎城大传》中介绍,一些国民党元老、杨的老朋友希望杨虎城反冯,杨不愿意得罪他们,也不想掺和此事。在杨虎城原十军内部也有矛盾刺激着杨虎城,他的一些老部下对杨重用共产党员不满,因此对杨虎城产生质疑。而在南京,杨虎城也并没有受到蒋介石的待见,蒋介石不肯因为改编杨的部队而得罪冯玉祥,因此杨虎城在南京也处处碰壁。此刻的杨虎城,心情比较低落。

于是他来到佛国净地普陀山,小住月余,疗养身心。杨虎城将军不迷信,但支持佛教事业,由于其母亲笃信佛教,杨虎城也颇有佛缘,早年在西安期间,他就曾经与高僧多有交往,偶尔还聆听佛法,认为了解一些佛法对调节身心健康颇有意义。

在江南这么众多的养心之地,为什么杨虎城独钟情于普陀山?据笔者猜测,杨虎城将军此行选择普陀山养心,也可能与同为陕西渭南老乡的高僧印光法师有关,1928年春印光法师居住在普陀山,其与陕西佛教界多有来往。杨虎城的普陀山之行极有可能想聆听法师老乡的指教。

在普陀山,杨虎城的心情还算不错,有时候还说说笑话。据曾经一起去普陀山的杨虎城的秘书王子安回忆,有一次杨将军与部下马青宛在路上散步聊天。忽然有一个和尚走到杨跟前问:“你们是陕西人?”杨说:“是的。”那和尚看起来很兴奋,他可能多年没有听到老乡说话,所以感觉特别亲热。杨问他为啥到这里出家当和尚。他说,他原是陕西张云山(陕西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的部下,后来看破红尘,到这里当和尚。杨说:“你多年出家当和尚,都不想老婆吗?”那和尚说:“你怎么胡说八道!”语毕悻悻而去,杨却哈哈大笑。

杨在普陀山的生活确实比较舒坦。从照片拍摄的位置看,他们离多宝塔较近,杨虎城一行在普陀山可能就下榻于多宝塔旁边的文昌阁,这个文昌阁是当时普陀山最好的接待场所。据王子安在《杨虎城将军在普陀山》一文中回忆,杨在普陀山“住的房间宽大明亮,房内陈设的都是现代家具。吃饭有鱼有肉并非素食,吃饭时有一和尚陪着聊天。……这足以证明普陀山的僧人,对照顾旅游者生活颇费心机”。文昌阁,是民国九年僧人化珣到上海募化而建的西洋风格建筑,用于接待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中西合璧的文昌阁服务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

穿西装的谢葆真女士

谢葆真是一位共产党员。不爱红妆穿西装,正是这位思想开放的进步女性的个性体现。

谢葆真,1913年生,陕西西安人。杨虎城大军转到安徽太和,那时的谢葆真正好在十军做宣传工作,她青春活泼,甚得杨虎城将军的喜爱。两人思想相投,都追求进步,彼此产生恋情。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在《往事——杨虎城之子回忆》中说:“他们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

1927年夏,魏野畴将谢葆真等一批进步青年调到十军以加强政治工作。谢先被分到政治处下属的宣传队任队长,1927年10月又被派至该军驻地安徽省太和县开展妇女工作。在太和县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主任委员。

1927年,谢葆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领导县妇女联合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各项活动:动员妇女参加妇联,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妇女缠足等等。为此,专门成立放足委员会,派人守候在城门口,向进城妇女逐个进行说服教育。与此同时,谢还办起一所贫民女校,帮助妇女识字、学文化。杨虎城对谢由赞扬、赏识到逐渐钟情。经请示中共河南省委批准,1928年春节前夕,谢与杨在其军部所在地教堂举行了婚礼。

普陀山之旅的一个月,或许可以算是谢葆真与杨虎城婚后的蜜月之旅。谢葆真随杨虎城从南京、上海,到普陀山,并陪同前往日本考察。此后基本不离杨的左右,谢葆真将主要精力用在支持和帮助杨虎城工作,以其特殊身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7年5月,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交出军权,和谢葆真赴欧美考察。同年11月底回香港,杨虎城后被蒋介石所派特务头子戴笠骗至南昌扣押。谢葆真在安排、托付了一切家事之后,带着爱子杨拯中,同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一起飞抵汉口,随后也到达江西南昌、湖南益阳,同杨虎城一起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他们先后被转押于益阳桃花园、贵州息烽玄天洞、重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等监狱。1947年2月8日,谢葆真含恨辞世。

穿中山装的知识青年米暂沉

照片中那位穿着中山装的青年就是米暂沉,他也是杨虎城的老乡,1902年出生于陕西蒲城的一个书香门第,1920年就读于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结识了时任该校教师的共产党人魏野畴,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渭南开展农民运动。杨虎城北伐经过渭南,看中了这位沉稳干练、才华出众的青年革命者,米暂沉成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并以此身份为掩护,参与中共皖北特委的工作。皖北暴动失败,魏野畴牺牲,米暂沉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1928年春,米暂沉随杨虎城来到南京、上海、普陀山,并一直陪伴到日本考察,照顾杨虎城夫妇的生活起居和工作。

西安事变期间,米暂沉多次代表杨虎城将军与中共代表接触,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局面作出了贡献。西安事变后,在杨虎城的安排下,米暂沉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习市政管理专业,还翻译了《市政管理学》一书。1938年米暂沉回国,在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附中任教,投入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解放后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主委。1978年,76岁高龄的米暂沉撰写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杨虎城的传记《杨虎城传》。

在杨虎城将军的革命道路上,他身边曾经有两位共产党员一直陪伴着他,一位是他的红颜知己谢葆真女士,另一位就是他的机要秘书——进步青年米暂沉。这幅普陀山上的合影照片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感谢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先生提供照片电子版)

◎史林偶拾

林森泪洒吴兴

□吴永祥

林森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老之一,福建人,曾任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立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等职。1943年,他在重庆逝世。

在他去世的10年前,即1933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打出了反蒋抗日旗帜。在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让福建人、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福建去劝说陈铭枢,让他放弃另组政府、反蒋抗日的计划,但遭到了陈铭枢的拒绝。

“福建事变”发生后,林森“痛哭流涕,长太息者数日”,后在其秘书、同乡林叔向的劝说下,出游吴兴。林森带着林叔向及卫从4人,坐车来到当时的吴兴县。吴兴县是民国元勋陈其美的家乡。陈其美,字英士,号无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同盟会元老,上海光复的主要功臣,上海光复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后陈其美参加反袁斗争,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后葬于家乡吴兴县城南岘山之麓。

陈其美去世后,林森曾写过一幅挽联,联曰:“万里归来,精灵若接;百年论定,功烈在人。”这次林森到了吴兴县,即赴县城南门外之陈其美墓拜谒。在陈其美墓前,林森先是朝墓三鞠躬,然后再登上墓后山巅之雄跨亭,在亭上远望不远处的碧浪湖和道场山。这时他又叹息起来,不禁老泪纵横,在亭中哭泣。堂堂国民政府主席,面对纷乱的局势,竟然只能以泪洗面,亦民国一奇闻也。

王奇给高阳纠错

□李健

1990年春,高阳随台湾《红楼梦》剧组来北京取景,有关方面在“芳园”酒家设宴款待。席间谈及高阳的历史小说《八大胡同》,书里提到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对别人赠送的金银珠宝不感兴趣,叫人把康有为送的祝寿联悬挂于寿堂正中,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龙蟠虎踞,八方风雨汇中州。”在座的《团结报》青年编辑王奇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我读过一些笔记野史,记得原联应是‘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汇中州’。”高阳感到有点意外,但还是鼓励王奇继续说下去。王奇说:“先生书中所引的‘百岁功名才半纪’,显然不符合吴佩孚当时的年岁。中国古时把十二年算作一纪,半纪才六岁,即便扩大到一个甲子六十岁,一半才三十岁。固然岳飞的《满江红》词中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名句,但这里与吴佩孚五十岁生日对不上号。而百岁功名的一半是五十,正好呼应他的五十大寿。至于‘龙蟠虎踞’是特指南京,不能作为洛阳的代称,而且放在这里与‘牧野鹰扬’不对称。”同桌的宾客听后一时无语,都把目光转向高阳。只见高阳沉吟片刻,点头说道:“你说的不无道理,下次再版要改过来。”

杨绛的“架子”

□张达明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偕王后访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国王时,特别邀请了杨绛参加。邓小平在将70万字的中译本《堂吉诃德》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的同时,并把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

此后不久,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本国政府口头邀请杨绛访问西班牙,却被她以自己“口语不佳”为由而婉言谢绝。为促成杨绛访问西班牙,西班牙第二任驻华大使又代表本国政府向杨绛送去了正式书面邀请,又被杨绛以正式的书面答复予以婉拒。第三任驻华大使决定另辟蹊径,恳请杨绛所在的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亲自出面,经过耐心细致做工作后,杨绛终于勉强接受了邀请,于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为此,钱钟书在和杨绛开玩笑时说道:“你的架子真大,要3个大使才请得动!”为表彰杨绛对传播中西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1986年10月6日,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对此,杨绛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觉得很惭愧。”

在杨绛眼中,功名利禄都是过眼浮云,总是“自觉自愿始终做零”,从容淡定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黄侃的直率性格

□唐宝民

黄侃是国学大师,学问绝对是一流的,但他说话口无遮拦。有一回,黄侃去拜访名流王闿运,王闿运曾经担任过曾国藩幕僚、清史馆馆长等职,为人洒脱,门生遍天下,学问精深,被当时的文坛视为泰斗级人物。王闿运对黄侃的诗极为赞赏,见黄侃来访,就笑着说:“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犬子虽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王闿运这么说,既是对黄侃的夸奖,也是一种谦虚的态度,黄侃就应该也说几句谦虚的话,哪知黄侃却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连小的带老的都给贬低了一番。

黄侃的这种口无遮拦,其学问一流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是因为性格直率。他不喜欢说虚伪的套话、不喜欢恭维,自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直率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品质。和直率的人打交道,你不必顾虑太多,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当代社会,率直已经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但大师们身上的率直性格,却仍能给我们提供榜样的力量。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帮助父母晒白麻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杭州市郊杭县有三分之一农民以种水稻、棉花和络麻等为生。到了农历9月,大批劳力投入收获的黄金时节,许多女孩子也参加劳动,在河边帮助父母清洗晾晒白麻,增加家庭收入。

徐永辉摄于1951年

宋家姐妹初次赴美真相

◎史林探微 □陈桂芬

中华民国先后有两位第一夫人,而且是亲姐妹,分别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宋家姐妹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众说纷纭。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们在1907年首次同船去美国学习的经过。美籍华人陈士翰(籍贯苍南,祖籍瑞安)父子花了数年时间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陈士翰的儿子1990年曾在美国修习亚洲研究课程,他曾到西雅图美国国家档案库多次实地见习,收集材料并作一篇期终报告。报告内容是涉及美国在1882~1943年间的“排华法案”,所有的华人登岸,都要经过留关、审查,华人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一法案,虽已在1943年立法废止,但种族歧视仍在社会各阶层存在。

在西雅图NARA的库藏中有几十万份有关这时期经过这一地区港口所有华人的记录:护照、相片、中英签名、财产证件、信件、家庭关系和通关员的意见等等。陈士翰查找那时代中国的几个有名人物资料,包括孙逸仙、胡适和宋家姐妹等。经过研究考证,1907年宋美龄是持“宋美林”的护照赴美,宋庆龄是持“宋庆林”的护照赴美,护照是上海道台瑞澂于1907年7月31日签发的,1907年8月1日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波爱德(M. P. Boyd)签署,“宋庆林”签证号为第59号,“宋美林”为第61号。这件事(龄或林)在36年后(1943)却引起一件外交上的小风波;她们乘坐的船是蒸汽轮“明尼苏达”号而不是大家所说的“满洲里”号赴美;上岸的地点是华州的汤生港(PortTownsend, Washington),位于西雅图西北方约四十几里处,而不是大家都以为的旧金山。1907年8月28日她们到达汤生港通关。通关员是专管华人入境事务的代理检查员亨利·门罗。护照上有他手写的“Port Townsend, Wash. admitted August 28, 1907. Signed Henry A. Monroe, acting Chinese Inspector in charge”字样。当年宋庆龄14岁,宋美龄只有9岁。姐妹俩入境美国后,开始了在美的学生生活。宋庆龄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3年大学毕业回国;宋美龄留学美国10年,1917年毕业于威尔司利女子学院后回国。陈士翰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文章在美、加两国发行的《世界日报》刊出,读者反响强烈,转载、打印、讨论很是热闹。2009年7月经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宋女士的要求,转载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研究动态》双月刊上。

为进一步比较和记述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人护照的异同和上岸、通关的正确地点,陈士翰于2009年8月特别去了一次宋氏姐妹当年上岸的汤生港码头和海关,同时也照了相片,和百年前的景色作一比较,并在同一双月刊上(2009/6期)刊发第二篇文章。当年的汤生港确是美国西北地区的良港之一,有很多东方来的船只都在此靠岸,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该港现已被华州其他大港口如西雅图和塔科玛所取代。19世纪90年代忙碌的汤生港的联合码头(Union Wharf),极有可能就是宋氏姐妹俩下船的地方。现在汤生港的联合码头已被改建为观光和休闲场所,只有数只轻巧的帆船而已。当年的海关移民大厦是移民政务所在地,距离联合码头只有5条街,现已是美国邮局了。陈士翰推断,宋庆龄和宋美龄下船后就来到这幢大楼,办理入境手续,然后转去东部,开始了她们多彩多姿的学生生活。